

闫志民 著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极左派 ——托派第四国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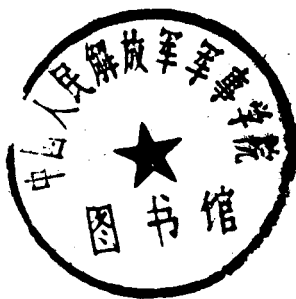
甘肃人民出版社



2 022 1128 5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极左派 ——托派第四国际

阎志民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屠新阳

封面设计：陈绍泉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极左派——托派第四国际

阎志民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8.75 字数177,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书号：3096·689 定价：1.20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第四国际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6)
第一节 第四国际的产生	(6)
第二节 前期的第四国际	(46)
第三节 1968年以来的第四国际	(77)
第二章 第四国际的组织状况	(103)
第一节 第四国际的主要派别和地区分布	(103)
第二节 第四国际的组织特征	(110)
第三章 第四国际的理论观点	(136)
第一节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136)
第二节 现代托派的“世界革命”战略	(215)
第三节 各托派集团的分歧和争论	(252)
结束语	(268)

前 言

托洛茨基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极‘左’的机会主义派别。它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时期。前期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个派别进行活动的，人们一般称之为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1927年和1928年，托洛茨基集团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被击败，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托洛茨基派便由俄国共产党（布）内的反对派变为一个国际派别，并于1938年9月成立了所谓第四国际，一直活动到现在。这后一段时期的托洛茨基主义，一般称为现代托洛茨基主义。对于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我国的读者过去知道得比较多，而对于现代托洛茨基主义，则了解得比较少。然而，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托派的活动日趋活跃，它们的组织在许多国家建立和发展起来，它们的观点对西方的一些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发生着影响。这种现象自然引起了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注意，提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批判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本书正是在这种形势和要求下产生出来的。它的任务是通过系统地评介第四国际的发展历史、组织状况和理论观点，结合进行一定的分析批判，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提供参考。

在这里我想着重从三个方面谈谈为什么要深入研究和批判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

首先，托派第四国际在当今世界上有一定的力量 and 影响。托洛茨基反对派二三十年代在苏联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逐渐消声匿迹。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苟延残喘之后，它却在国际范围内逐步发展开来，到了六七十年代，托派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当前已经成为一支值得注意的力量。据第四国际公布的材料，他们在全世界六十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各国的托派支部和小组总共130多个，成员有几万人。他们的活动地区，集中在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当中。托派对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从六十年代开始还在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参加了全国和地方的选举活动。在1969年的法国总统竞选中，法国托派提名自己的领袖克里文为总统候选人，选举结果，克里文得票239,000多张，占总票数的1.05%。接着他们又参加了1974年的总统选举，提出了两名候选人，一名是克里文，一名是拉纪埃，共获得了690,000张选票，占总数的2.7%。这就是说，他们所得的选票在五年中增加了两倍。此外他们还参加了1977年的法国市政选举，与其他派别联合，在巴黎的某些地区得到了2.7%至3.3%的选票，在里昂得到的选票超过了5%。法国的情况表明，托派第四国际在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当前仍在继续扩大。国际托派的主要头目芒代尔就曾吹嘘说，第四国际的人数1979年比1963年增加了将近九倍。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现象进行研究。

第二，托派第四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左派别的代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曾经出现过各种“左”的和右的

机会主义。作为“左”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是以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今天在西欧和拉丁美洲还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无政府主义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它对于革命工人的迷惑力是有限的。而最为危险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列主义旗号、以极端革命的面目出现的假左派。在这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派别到处活动的，就是托派“第四国际”。他们在政治上，以革命的左派自居，自称是世界上唯一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组织，唯一进行世界革命的组织，唯一的革命的马列主义的组织，他们的政党和集团，都要冠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国际主义共产党、革命共产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这类最响亮的名称，以表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彻底革命的和最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组织。其他的工人政党和群众团体，都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和不革命的。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极端主义的十分偏激片面的“左”倾观点。例如，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他们只讲革命的世界性，不讲它的民族特点，只讲各国革命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不讲各国革命的相互区别，否认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在谈到阶级斗争的问题时，他们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夸大过渡时期的阶级分化现象，夸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危险，把反对特权、反对官僚主义的口号变成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他们只承认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劳动人民统一战线，否定国际上的反帝统一战线、反霸统一战线和国内的人民统一战线、民族统一战线，把共产党人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

统一战线的思想斥之为投降主义和调和主义等等。在组织上，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公开宣扬党内派别自由和集团竞争，主张把党变成一个多种思潮同时并存、各种派别自由竞争的组织。托派在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他们的各种思想、观点和情绪，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特别是在一部分激进而又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影响。研究第四国际，批判他们的极左思想，对于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增强对于“左”倾机会主义的识别能力，防止犯“左”的错误，是很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第四国际是我们难得的反面教员。

第三、研究第四国际对于我们国家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中国托派曾一度是现代托派的最大的和最早的几个组织之一，后来虽然一蹶不振，但一直存在到解放前夕，和托派作斗争曾经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全国解放前夕，中国托派一部分外逃出国，一部分潜伏下来。经过镇反和肃反斗争，国内的托派已经被肃清，一些人正在被改造。但是外逃的部分，继续与我们为敌，不断对我国进行攻击污蔑，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他们又在港澳地区加强了活动。中国托派在国际上也相当活跃。彭述之领导的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国托派的多数派）是巴黎书记处的重要支部。彭述之在第四国际中也很有地位，是第四国际有数的几个元老之一。。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宣布他和弗朗克为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特别顾问，给他们以极高的荣誉和特殊的颂扬。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杰克·巴恩斯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主持举行了一次特别仪式，称颂他们是第四国际的创始人，说是要尽量地“利用他们的丰富

经验来帮助教育和训练全世界新一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托派第四国际一直十分注意中国问题。托洛茨基在二三十年代曾就中国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讲演和信件，这些材料已由中国托派分子整理出版，书名叫《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著）、《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的信》。托洛茨基档案在1980年公开以后，他们又整理出版了《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除此之外，第四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多次通过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第四国际的刊物也刊登过许多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对于托派的这些言论和活动，我们必须予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斗争。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研究托派第四国际，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特别是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本小册子正是为研究这个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努力和探索。

第一章 第四国际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第一节 第四国际的产生

托派第四国际是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产物。它的形成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苏联共产党(布)反对派阶段(1923—1928)

第四国际形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领导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首先，在国际方面，从1917年开始的世界革命风暴从高潮转入了低潮，帝国主义由战争和危机时期转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于是便自然地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下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其次，在国内方面，苏维埃俄国在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以后，进入了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这便提出了与过去的革命和战争时期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的新问题，譬如，苏联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问题，工业化的道路与速度问题，农业的集体化和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以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无现成的经验

可供借鉴，又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解决，于是便产生了各种观点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如果能象列宁时期那样，按照正常的党内生活原则和党内斗争方式加以处理，如果更多地引导党员通过实践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本来是会较好地解决的，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在争论中采取了派别活动的方式，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党内争论的后期，也不注意把思想分歧与路线分歧、把党内斗争与对敌斗争区别开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混淆了争论的性质，甚至用对敌斗争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这样便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扩大了分歧，使党内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造成了党内民主的严重破坏和连续不断的派别分裂。

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争论中，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左翼反对派”采取了极左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重大问题上：

第一，他们片面夸大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阶级分化现象，特别是夸大了苏联党和国家内部所出现的官僚主义危险。托洛茨基认为，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第二国际领袖普遍蜕化的先例。领导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也按照同样的历史法则，在和平时期的走上了蜕化的道路。他说，苏联党和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庞大臃肿而享有特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一整套“官僚制度”，这些官僚“吞掉了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的势力从1921年到1928年迅速增长，与城市中的耐普曼（新资产阶级）、农村中的富农一起构成社会上的敌对阶级，整个社会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结成联盟向富农、耐普曼

和官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

当时，俄国刚刚由革命和战争时期转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广大党员干部还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意志，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官僚主义只不过是是个别的或者局部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清醒地看到官僚主义的危险，正确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托洛茨基却颠倒了事情的本末，把官僚主义说成是普遍的和全局性的现实问题，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企图把过渡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主要归结为工人农民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显然是一种不符合当时俄国实际情况的错误的主张。另外，按照列宁的思想，革命队伍内部的官僚主义现象，一般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应当主要通过批评教育和群众监督加以解决，而托洛茨基却把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与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等量齐观，一概视为敌对阶级，甚至认为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是危险的敌人。这样，必然要混淆矛盾的性质，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和革命队伍内部。托洛茨基的这种理论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典型的极左理论。

第二，他们提出了脱离实际的“超工业化”计划。这种济经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片面强调工业，忽视农业，说工业化的速度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取决于真正的工业化”，把农业放到了可有可无和无足轻重的地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甚至主张采用使农民破产、农业崩溃的办法，也就是用排挤农业、剥削农民的办法，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他说：“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

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仰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这种政策，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工业的农业基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工农联盟。二是这种“超工业化”计划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工业；不顾经济指标的全面要求，片面强调发展速度；不顾主客观条件的辩证统一，片面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当时俄国刚刚经历了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经济陷于瘫痪瓦解状态，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又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处境是很不利的，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而托洛茨基却脱离客观实际，提出应该“用最大限度加快速度的方法，达到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比重全面增长”和“必须全面加速我国经济的工业化”之类的口号。这种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人为地加快发展速度的办法，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第三，他们反对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世界革命转入低潮、世界帝国主义包围着苏维埃俄国的形势下，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及时提出：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俄国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内部依靠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外部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在苏联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托洛茨基则反对这种主张，断言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形成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民族国界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最严重的障碍。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通过阶级斗争废除国界，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与国家疆界毫不相容的

以高度发展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首先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被斥之为开历史的倒车和把生产力拉向后退。他说：“如果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他还曾预言，在孤立的国际环境下，苏联既得不到工业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又不能输出多余的粮食和原料，它必然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下垮台。然而历史证明托洛茨基的理论是错误的。他夸大了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忽视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只看到生产力发展的规模超出了民族国界，而没有注意到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舞台还在国内。而且，世界经济联系在各个地区表现得很不平衡。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种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而对于经济不够发达的俄国、中国来说，这种联系则比较松弛。此外，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对于大国和小国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比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独立性。俄国的无产阶级正是利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些特点，坚持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建立在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的基础上的。早在1906年，托洛茨基就在《回顾与展望》一书中预言，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必然同农民决裂和厮杀起来，只有自身力量可以依靠的俄国工人阶级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它后有本国的反革命势力，前有欧洲反动势力，随时都会被击溃，它只有把自己政治统治的命运，也就是整个俄国的命运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从这种错误见解出发，他曾多次提出：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在保守的欧洲面

前站住脚”。十月革命后，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便由公开否认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变为承认这种联盟的现实性，但又说，工农联盟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政治法律条件”，它不能从经济上解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这样写道：“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不是把自己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国内，而是放在国外；不是主要依靠本国的工农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要苏联人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当时已经低落下去的国际革命的援助上面。他津津有味地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主要国家内的胜利将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并将解除我们的沉要的军事负担，它将大大地在技术上加强我们，大大地加强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的全面发展。它将使我们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就是以最先进的技术 and 所有成员真正平等地劳动和享用劳动成果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托洛茨基勾画的图景无疑是有诱惑力的，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当时是不存在的。这种画饼充饥式的革命空谈只会使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悲观失望。

托洛茨基的观点也是建立在对世界革命发展进程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它既不能经过一次或数次的发动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取得完全胜利，也不会所有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此，首

先取得胜利的国家不能等待其他国家的革命，它必须从本国革命胜利之日开始，就准备和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利用这个基地去支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进程作了完全不同的估计。他把世界革命设想为连续不断的一次完成的过程，认为从十月革命开始，世界进入了革命时期，各个国家将依其不同的情况先后不断地爆发革命，直至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因此他断言，十月革命以后的几十年，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世界经济体系，然后才能在有高度国际分工的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不应当以主要力量进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应当输出革命，全力推进其他国家革命。他曾有一句名言：“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据托洛茨基估计，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至少需要三十至五十年的时间，而西方无产阶级只需要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时间，就会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且就成功率来说，世界无产阶级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内夺得政权的机会决不是比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机会少，而是更多。

面对托洛茨基的这些脱离实际的估计，人们反问道：如果西方革命来迟，苏维埃国家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击中了要害。他有时默不作声，有时又不得不作出回答。1922年他在关于俄国革命四周年的讲话中明确宣布：“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还能存在几十年，那么这对于社会主义的俄国等于说是判处死刑。”1929年在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的时候，他又说：“如果苏维埃共和国日后得不到国际革命成功的支

持，那么建设的进展必将被矛盾所淹没”。托洛茨基这种要么全部胜利、要么全部失败的公式，在当时各国革命形势低落的条件下，只会导致两种结果：或者冒险地在各国发动革命；或者对苏维埃俄国的前途丧失信心。无论那种结果，都会给国际无产阶级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托洛茨基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提出的这三条理论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就注定了他自己以及整个联合反对派在争论中必遭失败的命运。

托洛茨基和他所领导的集团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派别分裂活动。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主义工党内部长期存在着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斗争，在这两大派之间还有一些中间派别和少数民族的党组织。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但仍受着长期形成的派别斗争的影响。在十月革命后的党内斗争中，曾多次出现与中央委员会多数相对立的各种派别集团，如“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等。鉴于派别斗争给党的团结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损害，1921年3月举行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9—232页），宣布毫无条件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规定了制裁党内派别活动的一系列组织措施。但是托洛茨基不顾党的决定，在1923年秋季开始的党内斗争中首先组织了以他为核心的“左翼反对派”集团，同党的中央委员会相对立。后来的第四国际便由此发源。

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在联共党内进行了三次